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日本學

第十四辑



世界学术出版社

日 本 学

第十四辑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



世界学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柏 英

特约编辑:林 昶

装帧设计:林 昶

责任出版:刘林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学:第14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12-3343-4

I. 日... II. 北...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4449号

日本学(第十四辑)

Ribenxue (Dishisiji)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邮政编码:100010)

网址:<http://www.wap1934.com>

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照排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58千

2008年4月第一版 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3343-4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日本学》是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辑的学术论文集。它的宗旨是，对日本进行综合研究，探索其与他国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深层文化方面的特点。故命名为《日本学》。

研究日本学必须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观察日本，而不失之偏颇，才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日本，客观地评价日本。《日本学》采取这种态度。

一国的特点只有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比较必须是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的方法既可以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传统方法，也应该吸取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新鲜方法和现代化手段。《日本学》提倡并突出比较研究、学际研究，重视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按照某种主观意图去剪裁甚至曲解事实，这种削足适履式地为现实服务的方法，是不足取的。提供确切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解释，是学术发挥其社会效益的唯一正确途径。《日本学》坚持这一原则。

日本学的定义、内涵，乃至其能否构成一个学科，人们意见未必一致。尽管如此，日本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研究的对象，并且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应该积极吸取国内外各学派的日本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应照搬，不应人云亦云，做传声筒。历史证明，照搬、当传声筒只会扼杀创造性。《日本学》的目标是建立中国自己的日本学。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全国日本研究者的坚毅的努力。

《日本学》虽然主要反映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取得的成果,但它并不是狭隘的同人出版物。《日本学》实行开放的方针,热忱欢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在这块学术园地上发表论著,交流见解,展开争鸣。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目 录

中日文化比较带来的思考 刘德有 (1)

日本古代文明的历史考察

——与“海洋的日本文明”史观的商讨 严绍璁 (17)

中日文化交流五次高潮的特点 汤重南 (27)

日本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与演变 魏常海 (46)

中日家训特征之比较 李 卓 (59)

试论古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和特点 王晓秋 (75)

朱子学与近世中日韩三国的政治文化 宋成有 (90)

幕末动荡社会中的信仰(续)

..... [日]宫崎史子著 刘琳琳译 (110)

幕末明治初期的“宪法”与“国体” 张允起 (126)

徐光启的日本观研究 初晓波 (141)

日本解决劳资纠纷和推进劳资关系和谐的举措

——以劳动审判制度为例 熊达云 (155)

日本选举研究：现状与展望 张亲培 (171)

中国对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研究述评(1995—2007)

..... 李寒梅 (181)

日本中央政府高级公务员的选拔、开发与领导人才

任用标准 白智立 (197)

后冷战时期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与国家发展

战略：影响及局限性	王星宇 (213)
战后日本新宗教参与政党政治的方式、	
动因及其认识	邵宏伟 (231)
扩大战略互惠 谋求共同发展	樊勇明 (249)
以和制胜 引日入亚	
——在日本看胡锦涛主席第一任期的对日外交	
.....	赵宏伟 (257)
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	梁云祥 (271)
环境合作与中日关系：新挑战与新机遇	张海滨 (289)
编辑后记	(309)

中日文化比较带来的思考^①

刘德有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日文化比较带来的思考》。

我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重视文化的差异与不同文化背景；第二是不要把日本人的审美观绝对化；第三是文化研究与科学态度。

21 世纪是一个更为快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人类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带来思维方式和其他行为模式的改变，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世界性多媒体结构，使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展具有全球性，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这就使各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大大地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

大家知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为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看似容易，实际做起来很难。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一点我想不必举更多的例子。在东西方之间很难沟通的事情，中国和日本之间就比较容易沟通。比如说，李白有一首大家熟悉的诗《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日本有一位吟诵中国诗的妇女，她主张吟诵中国古诗必须用中文。她去美国吟诵上面那首诗时必须向美国人解释“幽人”是什

^① 本文系刘德有先生于 2006 年 12 月 6 日在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名家讲座”所做讲演的录音整理稿，已由刘德有先生本人审阅。

么意思。现在在日本，年轻的一代看到“幽人”两个字也不一定能明白，因为他们的汉文底子不深。但是老一辈的人汉文底子比较深，一看就明白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会说，“幽灵”我明白，但“幽人”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在美国解释起来就更难了，要讲老半天。实际上，“幽人”就是避开城市的喧闹，到深山老林去隐遁的人。日本话是“隐遁者”(いんとんしゃ)。可是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其中有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说：“Oh, I see, it is homeless.”(哦，我明白了，那是无家可归的人。)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里，就有不少 homeless——无家可归的人、失业者。美国人以为“幽人”大概就是那样的人。还有，“一杯一杯复一杯”，如果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他们会想象在山中的隐遁者肯定拿的是小酒杯。但是美国人想象的，肯定是口杯，而且喝的是威士忌。由此可见，东西方之间很难理解的事，在中日之间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如实地承认中日两国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存在着难以理解的一面。我认为承认这一点很重要。过去我们同日本关系好的时候，强调共同点很多，我认为那是必要的。但是今天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仍然强调我们的共同点，已经不够了。应该如实地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简直就是“异文化”。

我先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大家知道在北海柳荫街附近有一个王府，叫“恭王府”，游客特别多。恭王府里面有很多事物与蝙蝠有关。比如说有一个形似蝙蝠的池子，叫做“蝠池”。建筑物的里里外外，到处是蝙蝠的图案。中国人一看就明白，蝙蝠的“蝠”跟有福气的“福”谐音，很吉利。据统计，恭王府里除了康熙写的那一个真正的福字以外，其他的都是象征性的东西。蝙蝠，对于西方人来说，一定会感到很可怕。因为在西方蝙蝠是一种恐怖的象征，而且往往是跟死人联系在一起。我记得年轻时看过影片《双城记》，一开头便出现了在黑暗中乱飞的蝙蝠。在中国人看来，蝙蝠和福有

关,但在西方人看来觉得恐怖得很。日本人看了蝙蝠,会怎样感觉呢?我认为,绝对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前面说过,池子的形状虽然搞成蝙蝠的样子,说那是一个幸福的池子,外国人决不信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理解就不会一样。

我们再从反映民族感情和心理状态的文学作品——日本的俳句来看,也能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同和差异。俳句是一种短诗,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由五七五——五个音、七个音、五个音组成的短诗。它的特点是省略了很多话。你想,一共 17 个音,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传统俳句里还要有一个季语,即表示季节的词。季语有比喻、象征等含义,可以使读者产生许多联想。总的来讲,俳句要捕捉瞬间的感受,尚凝练,无背景,多省略。虽然日本的俳句现在在中国翻译了许多,但中国人要去理解它是很不容易的。举一个例子,著名俳人正冈子规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

柿食へば鐘が鳴るなり法隆寺。

已故日本文学研究者李芒先生生前把它译成了非常漂亮的中文:

方啖一颗柿,钟声悠婉法隆寺。

意思是刚刚吃了一颗柿子,就听到从法隆寺那边传来了悠扬的钟声。就是这么简单。中国人看了译文,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吃了柿子钟声响了,难道吃苹果不行吗?然而,日本人读了这首俳句,感受就会不一样。“柿”这个季语,表示秋天,而且日本人知道,作者子规是非常喜欢吃柿子的。子规从他的家乡松山回东京的时候路过奈良,而奈良是柿子的产地。他怎么能放过这个吃柿子的机会呢?子规正在吃柿子,就听到了法隆寺方面传来的悠扬的钟声,日本人就能从这首俳句感受到秋意渐浓,再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可以联想许多事情。但是,你要中国人也去这样理解,我认为很困难,或者说简直是不可能的。

再举一个例子。这也是一位有名的俳人——与谢芜村写的一

首俳句：

易水にねぶか流るる寒さかな。

根深(ねぶか)就是葱(ねぎ),大葱的意思。我国著名的诗人、今年已经 92 岁的林林同志把它译成：

青葱漂流去,易水今犹寒。

大家知道,芜村没有来过河北省的易水,这是他的想象之作。根据《史记》的记载,燕国的太子丹,忍受不了秦始皇的欺辱,派荆轲去刺杀秦始皇。荆轲从易水临出发的时候曾经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汉学底子的日本人都会读:“風蕭蕭として易水寒し、壮士ひとたび去りて再び帰らず。”显然,芜村是在读了它以后,想象了一种情景,写出那首俳句。它的意思是说,因“风萧萧兮易水寒”而闻名遐迩的易水,今天就像荆轲出发的时候一样,又是一个寒冷的天。猛然一看,不知是谁在上游扔了一棵大葱,这棵大葱随着水漂啊、漂啊、漂啊,从上游漂了下来,顺流而下。而大葱茎部的白色使人感到更加寒冷。作者是用叶绿茎白的大葱来衬托易水寒。林林同志在翻译这首俳句时就说说过中国人很难理解。是的,中国人看到大葱白色的茎部谁都不会感到很冷。但日本人的感觉就不一样。当然,中国的北方一到冬季,新下来的大葱在早市上堆积如山,形成冬天的一景。但是,正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大葱的白色茎部感受到的季节感跟日本人不一样,并不觉得寒冷。因此,从上游漂下来的大葱跟易水寒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我认为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

再举一个例子。江户中期有一个女俳人,叫加贺千代,她也有首非常著名的俳句:

朝顔につるべ取られてもらひ水。

意思是说,井边的水桶被牵牛花的蔓给缠住了,女俳人清晨起来想打水,看到这一情景,只好到邻家去要了一盆水洗脸。意思就这么简单。这首俳句,在中国有很多译法。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

家，今年 90 多岁的一位老先生，把意思译出来了：“蔓延在吊桶上的牵牛花，为你从邻家讨来了井水”，但，这不像俳句。李芒先生译作“吊桶盘缠牵牛花，索水乞邻家”。还有的人译作“井筒缠上牵牛花，晨起汲水乞邻家”。我曾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同志，她刚从大学毕业，她告诉我在大学时曾经学过这首俳句。她那时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牵牛花缠上了水桶，无奈，只好到邻家去要了一瓢水——如此简单的事情也能成为文学？她感到很奇怪。可能有的中国女同志会觉得牵牛花的蔓真讨厌，缠住了水桶不能打水，干脆就把它拔掉算了。然而，这首俳句的特点是表现了女性的柔情和对弱小生物的爱怜之情，不忍心把花蔓弄断，便向邻家去乞水。当然，中国妇女当中也会有像作者一样的那种心情，不忍心把牵牛花拔掉的。

我列举了这些俳句的例子，是想说明要加强相互理解，就要特别重视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现在有几部中国电影在日本上映，非常受欢迎。日本在上映这些影片的时候，往往把原来的片名加以改动。其中有一部大家熟悉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写的是两代邮递员的生活。在日本上映时没有用原名。如果把中文的片名直译成日语《あの山、あの人、あの犬》。日本人看了，一定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是《那山那人那狗》？影片中的邮递员每天要爬山，要碰到很多熟人，他家里还养着一条狗。中文的片名比较艺术，文学味较浓，也很含蓄，中国人从这样一个有文学味的片名中会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如果要日本朋友也去那样联想，恐怕是很难的。在日本上映之前，广泛地征集片名。结果，应募的有 800 条意见，从中选了一个，叫做《山の郵便配達》。译成中文就是《山间的邮递员》或《山区的邮递员》。这部影片在日本很叫座，除了影片本身的内容感人外，跟起了一个好片名有很大关系。为什么要修改片名？就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还有一部片子，大家也是很熟悉，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写的

是一个乡村女教师，她教的那群孩子当中有一个男孩很调皮，自己跑了，跑到城里。这位老师非常执著，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找到，一个都不能少。如果要是用日文直接翻译的话，可能是《一人も欠かせてはならない》。这显得太生硬了，也不知所云。在日本上映的时候片名也加以改动。改成了《あの子を捜して》，中文是《帮我找那个孩子找到！》。很贴切，而且很容易打动观众的心。

日本电影在中国上映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都照搬原来的片名，有时也把它加以改动。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在刚刚改革开放时进口的一部片子，叫做《追捕》，高仓健饰演杜丘，中野良子饰演真由美。高仓健和真由美直到今天在中国还非常有名，有很多“粉丝”。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新电影甚少，加之那部影片的主题歌很好听，所以一下子红遍了全中国。这部影片原来的日文片名并不是《追捕》，而是《君よ憤怒の河を渉れ》，中文是《你要渡过愤怒之河》。《追捕》这个片名要比《你要渡过愤怒之河》，响亮得多。

有些词语的翻译，也要考虑两国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人强调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常常说不能“走马看花”。“走马看花”怎样翻译？我记得有两种译法，一个是照字面译作“馬を走らせて花を見る”，意为“骑着马赏花”。有人说，这样译太长了，再短一点好，于是，译作“馬上の花見”。听起来，好像挺文学的，但，请仔细想想，这样翻译，能使日本人理解为“只看表面，不深入调查”的意思吗？我想，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为什么？因为在日本一说“花見”，指的是赏樱花。赏樱，在日本已经成为传统，成为日本人的文化生活之一。不信，你见到日本朋友，说“花見”，他决不会理解为去看牡丹花。赏樱，本来就是风流雅事，你还要骑马，那不是更风雅了吗？“馬上の花見”这一译法，看起来很优美，但我觉得害处颇大。因为不会使日本人真正地理解“走马看花”的意思。因此，我认为哪怕是啰嗦一点，遇到这样的情况，还是要用日语解释一下：“うわべを通り一遍見るのではなく、じっくり腰を落ち着けて調査研究を

する。”这样，才会使日本人得到一个准确的印象。

大家都熟悉的日本歌曲《北国之春》，日文歌词中有一句话：“季節が都会では分からないだろうと、届いたお袋の小さな包み。”直译过来就是：“老妈妈担心在城里住的儿子不知季节的变换，寄来了一个小包裹。”接着，唱道：“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能回到故乡。”然而，在中国这句歌词被译作：“住在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妈妈犹在，寄来包裹，送来寒衣，御严冬”。

这首歌在中国流传开来的时候，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既然是北国之春，为什么妈妈还要送来御寒衣呢？原歌词中，并没有说是衣裳，只是说寄来一个小包裹——“小さな包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就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走入误区”。因为中国人的脑子里想到的是，住在东北乡下的老妈妈想到，城里的儿子会不会冷啊？于是，就给他送来棉衣。恐怕译者就是那么想的，他看到“小小的包裹”这句话，就想当然地联想到包裹里面肯定是衣服。因为在中国有那么两句诗，深入人心：“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人们一下子就想到可能跟衣服有关系。实际上，《北国之春》这首歌送来的不是寒衣。按照日本人的理解，“小さな包み”里头放的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吃的东西。不同的季节里，吃与那个季节有关的食物，而这种食物在乡村有，城市里可能没有，妈妈就把它寄来了。比如日本的什么草饼（くさもち）、蕨饼（わらびもち）等等吧。如果对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不了解，就会造成这样的错误。我举这个例子，绝没有贬低翻译《北国之春》歌词的这位译者的意思。这位译者后来亲自跟我讲过：“我那一句翻译的不恰当，不过已经约定俗成了，再改也难。”的确，已经约定俗成的东西要改，是很难很难的，简直比一次“大革命”还要难！

在做文化比较的时候，大家经常说，日本文化有很多是从中国传来的，因此你要寻根的话，肯定会寻到中国。是的，这种情况多得很。但，是不是所有相似或相同的东西，都是从中国来的？这似

乎需要打一个问号。恐怕不能简单地这样说。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吃生鱼片。

尽管中国人古时候也吃过生鱼片，但吃生鱼片未必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你说中国人古时候吃生鱼片，有何为证？据《诗经》记载，公元前 823 年周王举行宴会时，就提到“脍鲤”。“脍鲤”就是生鱼片。宋朝诗人梅尧臣也有一首诗：

汴河西引黄河枝，黄流未冻鲤鱼肥。

随钩出水卖都市，不惜百金持与归。

我家少妇磨宝刀，破鳞奋鳍如欲飞。

萧萧云叶落盘面，粟粟霜菊为缕衣。

你看，这是不是在做生鱼片啊。——把很肥的鲤鱼买回家去。这条鱼活蹦乱跳，像飞了似的，少妇拿着一把刀把它一片一片地“片”了下来。“萧萧云叶”，很薄很薄，像云叶似的落在盘面上。然后还要把霜一样的白萝卜，一缕一缕地削下来。由此可见，中国在古代不仅吃生鱼片，而且还配上萝卜丝。今天日本人吃生鱼片，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有人会说今天日本人吃生鱼片时配上萝卜丝是从中国学来的，我看未必。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的日本人恐怕自古就吃生鱼吧，并不一定是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以后，日本人才开始吃生鱼的。萝卜丝恐怕也是日本人自古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和日本自古吃法一样，只能说是偶合。然而，在中国这种吃生鱼的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消失了，当然在中国的南方一些地方还有吃生的，或吃半生的习惯，但极少极少。现在，通过与日本的交流以后，北京等地开了很多日本料理店，出售生鱼片。喜欢吃生鱼片的中国人也大为增加。在中国，过去叫“生鱼片”，现在行家就直接按照日文，叫做“刺身”。吃生鱼片时要蘸绿色的芥末，日语叫“山葵”（わさび），中国俗话叫“辣根”。尽管中国人古时也吃生鱼，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日本人吃生鱼是从中国学去的。我想强调的是，在做文化比较的时候，不能一看到和中国一样，就说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样一种过早下结论的方法未必科学。

下面谈一下文化差异。在做文化比较时，人们常常提到日本人讲话很暧昧。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暧昧？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流传一种说法，说日本人暧昧，日本话也暧昧，这似乎已经成了定论。不少人还举出很多例子，说日语本身暧昧、模糊，逻辑性不强。乍一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在考察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时，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日本人讲话，一般来说，喜欢暧昧、模糊、含蓄、委婉，这是事实。但是，日本人并不总是暧昧的。曾经在东京常驻过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顺然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做《日本第三次开国》。他写道：“日语果真是那样的暧昧吗？的确日语有暧昧的一面，而这一点也很方便，甚至能使人感到有一种感情色彩的东西，但是这绝不是说不能把日语写的明了和严谨。我在日本工作，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到东京后首先等待我的是住公寓，签合同，那份合同所使用的日语非常明确和严谨。也许在房东看来，这合同还不够明确和严谨。过了两年以后，在更新合同的时候，又作了几处改动。我恍然大悟，只要你想把话说得明了、严谨，日语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应当说明，语言文字的暧昧模糊、含蓄甚至朦胧，绝不是日本独有的和固有的。我们注意到，有些外国的学者，特别强调日本的这种暧昧性、模糊性和不合逻辑性，似乎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其实，这样一种现象在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语言生活当中，也随处随时可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外交上双边或多边发表的外交文件，有关各方都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把模棱两可的话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在外交上是很普遍的。因为有利利益冲突，需要找到一个谁都能接受的表述方法，因此常常是模棱两可的。而模棱两可，可以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这种情况，在联合声明中经常见到。

尽管说话暧昧是普遍现象，但日本人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一些，构成了日本人的语言生活乃至日本文学的一个特点。这种语言习惯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日本人的心灵中间，不容易改变。尽管如此，

现在有两种情况正在迫使日本人在一定的场合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一个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信息的大量增加,生活节奏加快,要求高效率、少说废话,把必要的信息用最明确的语言、以最简洁最直截了当的形式提供出来,而不要拐弯抹角、含糊其辞。这是科学的进步逼使人们不能不这样做。你啰里啰唆说一大堆,不解决问题,废话连篇,不行。二是随着国际化,日本人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机会增多,日本那种叫“腹芸”(はらげい)的小动作,那种心照不宣、暧昧模糊等手法,今后尽管在外交上仍将继续使用,但未必总行得通。在国际事务中不明确表示“yes”或者“no”的那种八面玲珑的做法,显然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我认为说日本人暧昧和日语暧昧,是要进行分析的。当然,我们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日本政界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活动和国际交往中,特别喜欢使用暧昧模糊的语言来回避矛盾,或者不敢接触问题的实质。应该说这种暧昧模糊是“虚像”,而在“虚像”的背后常常掩盖着“真相”、“实像”。日本有一个著名诗人、评论家叫大冈信,他在《朝日新闻》上写过这么一段话:“日语决不暧昧。”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195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很不像样的决议,所以大冈信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日语决不暧昧。他指出,这一决议有意识地、暧昧地使用日语。很显然,决议的文字就是为了达到模糊战争责任的目的。他说:“日本应当明确地承认过去做的事,自己做过的事,应当用明确的语言加以描述。不这样做的后果,对内对外不知带来多大负面影响。特别是会严重地影响下一代的历史认识教育,对于这一点应当负责地加以考虑。”我觉得这是一位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的话。由此可见,日本人和日语决不暧昧的,要想把话说明确,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你想说明确还是不想说明确。而且,上面所说的那种暧昧模糊不仅是日本独有和固有的,其他国家也有。中国人也有,其他的外国人也有。所以我认为应该加以分析。

下面我谈第二个问题。不要把日本人的审美观绝对化。